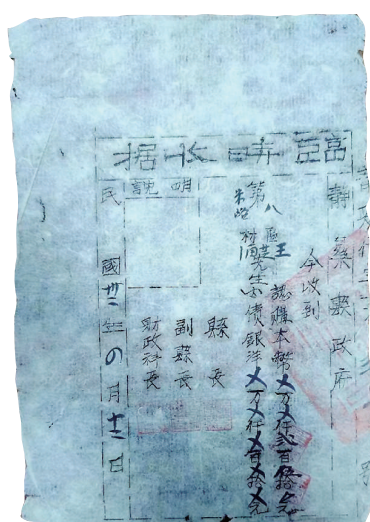




响应号召 认购『农币』



1943年静乐县政府为王芝润出具的“临时收据”

1943年1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作出《关于晋西北财政建设工作的决定》，为巩固西北农民的币值，晋西北根据地禁止法币和省币流通，回笼银元。4月12日，米峪村（今属娄烦）的富户王芝润，在其堂哥王芝茂的动员下，用银元认购西北农民银行币二百伍拾元，为支持根据地稳定货币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区公所的干部给王芝润开出了一份认购公债的“临时收据”。收据由静乐县政府出具，系麻纸，长18.5厘米，宽13.5厘米，文字蜡版刻印，空白处毛笔填写，内容为：

临时收据
静乐县政府
今收到第八区米峪村王芝润先生认购公债本币×万×仟式百伍拾元零银洋×万×仟×百×拾×元
县长(章) 副县长(章) 财政科长(章)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下旬，遵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等率八路军第120师主力挺进抗日前线，进入晋西北地区。在中共晋西北临时区委及牺盟会、动委会的配合下，八路军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建立武装自卫队和工、农、青、妇等抗日救亡团体，开辟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1939年12月晋西事变以后，晋西北完全成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兴县成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首府。这时根据地使用的货币是银元、法币与山西省币。法币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所谓“法定货币”，简称“法币”。山西省币是阎锡山政权发行的货币，简称“省币”。

1940年2月，晋西北行政公署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促进物资流通，在兴县成立了“晋西北农民银行”，发行“西北农民银行币”，简称“农币”，亦即为收据中所称“公债本币”。

1940年6月，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把原来的四个区划分为八个区。原娄烦地区的二区分为二、六、八三个区；米峪镇为八区，辖区包括西南两川、细米沟一带，区公所驻地米峪镇村，区长为静乐县早期共产党员、米峪镇村人王芝茂。1943年1月，晋西北根据地开始禁止法币和省币流通，回笼银元。1943年2月13日，《抗战日报》发表赵立德的署名文章《发动认购公债运动》，宣传推销公债。同时，静乐县抗日民主政府也动员本县各地的商户、富裕户踊跃认购。这份由娄烦县收藏家强建生收藏的“临时收据”，就是当年群众认购西北农民银行币，支持根据地稳定货币作贡献的实证。

李进才供稿 张贵桃整理

水陆攻战纹铜钊

黄琳



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钊四面线描图

山西博物院藏战国水陆攻战纹铜钊，表现了一个激烈的战斗场景。

钊，古代盛酒器皿，青铜制成，方口大腹，腹上部有对称兽面辅首衔环。此件铜钊直口，直颈，深腹中鼓，高圈足，通高33厘米，圈足边长13厘米，四壁以红铜镶嵌并错出五层水陆攻战图，具体内容为戴盔甲的甲方与乘船而来的乙方的战争。

图案最底层为乙方乘船入侵；其上二三层为甲方调集兵卒上坡奔跑与乙方交战，并有甲方曳地长裙，用觚自壶中舀酒持之捧饮的场景，这可能是一种战争前的礼仪；第四层为交战图；最上层为甲方获胜后庆祝宴图。铜钊四面共有人物63人，其中甲方39人，乙方24人。

观此钊如观四幅画屏，色调和谐，主题明朗，63个人物皆呈紧张动态，使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听，战鼓雷鸣，是战士们在奋力咆哮；看，雄姿英发，是英雄们在披荆斩棘。铜钊集实用与观赏为一体，堪称极品。

凌霄双塔的同工异曲

太原双塔犹如一双孪生姊妹，相映成趣，构成“双塔凌霄”的奇观，成为太原珍贵的地标建筑。

常见的双塔一般都形制相同、规整对称，而太原双塔虽均为砖筑楼阁式、八角形、十三层，具有相同的时代特色，却同工异曲：一座装饰华丽，琉璃满身；一座朴实雄奇，冷峻深沉。差异化互补让太原双塔别具一格，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韵味。

两座塔“一先一后”。两座塔间隔近十年，由两个团队分别建造。文峰塔建于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由太原士绅推举傅山祖父傅霖主持修建。宣文塔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由妙峰法师奉旨主持修建，历时五年。

两座塔“一高一矮”。文峰塔和宣文塔分别高54.76米和54.78米，在现存全国砖塔成双组合实例中，是形制最完善、规模最大、塔身最高的一组。宣文塔由皇家出资发起，工艺更加考究，外饰繁复华丽，但比先建的文峰塔高度略低2厘米，这个细节人们难以察觉，却巧妙化解了“后来居上”争锋比高的思维定势，体现了对先贤的敬意和礼让，同时也保证了建筑群整体的协调一致——一座简朴有力、高度占优，一座风韵华美、矜持低调，两者高低错落，相得益彰。

两座塔“一正一斜”。宣文塔笔直屹立，文峰塔略微向西北倾斜，塔身稳固400余年岿然不动。

两座塔“一简一繁”，风格各异。文峰塔是民间修建，古朴大方，素边檐子简约明快，收分不显，直径几近相同，故而挺拔壮美。宣文塔具有皇家色彩，塔身收分明显，轮廓呈弧状流线性，琉璃剪边檐子及莲花独特精美。

两座塔“一道一佛”。文峰塔最初是一座风水塔，创建原因是为补太原城“西北高东南低”地形的不足，用以“开山川之形胜，创文运之兴盛”，扭转宋朝对于晋阳古城毁灭后太原人才匮乏、文气不旺的局面(明代晋阳地区没有产生过一名状元)，表达期盼文运兴盛、气象更新的美好心愿。宣文塔建塔费用主要由第十一代晋王朱敏淳母亲李太后所出，旨在祈福绵寿、延长国祚，第一层檐檐枋下用砖雕刻的“阿弥陀佛”四字，犹如一条飘带，层层叠压，美观而匀称。

这些大大小小的差别，反映了两塔的不同属性，呈现出古城太原的特定历史，也诠释着山西兼容并蓄的建筑风格。

400多年来，寒来暑往中，同中存异的永祚双塔，互相陪伴，彼此成就，一起感叹古城岁月的更迭，一同见证并州历史的变迁。 本版综合整理



凌霄双塔 姚腾飞 摄

鱼跃龙门盼成才

傅静 王仁爱

自古以来，考试都是检验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之一，因而留下了许多与考试相关的文物。

民间常把科举及第称为“跃龙门”“登龙门”。鱼化龙是中国传统纹样。这种“龙鱼互变”的纹饰样式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为历代民俗、传说衍变而来，其历史渊源悠久，可追溯到史前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时期的鱼图腾崇拜。

宿州市博物馆藏辽鱼化龙纹桃形执镜，鱼龙盘曲，呈飞跃状，左侧有一横置的堤坝，鱼跃过坝的头已变成龙，瞪目吐舌，头生短角，鬃发飘卷，旁有云雾缭绕。坝下的身躯弯曲，分叉状鱼尾，脊鳍明显，周围有涡旋的浪花翻滚。整个镜纹表现了鱼化龙的过程，纹饰流畅，简洁生动。这令人想起中国十大古典名剧《琵琶记·南浦嘱别》中的唱词：“孩儿出去在今日中，爹爹妈妈来相送。但愿鱼化龙，青云得路，桂枝高折步蟾宫。”

国家博物馆藏玉鱼莲中环，白玉质地，镂空单面雕刻着一条弯状鱼，鱼尾上翘，跃然游动于莲荷之间。鱼身光滑无纹饰，只有鱼鳍部分雕刻有阴线纹。一枝结着花苞的莲梗从鱼腹绕到鱼身上方，和鱼腹形成穿带大孔，系于头部巾冠之上，称为“冠巾饰”。鱼莲中环寄托了人们金榜题名、高升昌盛的美好愿望。

唐宋元明清时期还有不少与科举有关的铜镜，铭文有“状元及第”“五子登科”“状元拜相”“连中三元”等，有的还在铭文周围加饰传统的吉祥图案，丰富了吉祥的内容。这些都表达了人们渴望借助于科举考试达到改变人生命运的愿望，成为承载科举历史等信息的重要文物。

“五子登科”本为中国民间谚语，最初来源于民间故事。话说五代后周时期，燕山府有个叫窦禹钧的人，他的五个儿子都品学兼优，先后登科及第，故称“五子登科”。宁波博物馆藏明代“五子登科”镜便寄托了人们期望子弟都能像窦禹钧五子一样获得科考成功的美好愿望。这方“五子登科”镜，圆形，圆钮。其外环饰一周凸弦纹，窄缘。中心的钮上下左右各有一凸起的方框，框内各铸一楷字书铭，合读为“五子登科”。

玉鱼莲中环(国家博物馆藏)



辽鱼化龙纹桃形执镜(宿州市博物馆藏)



明五子登科镜(宁波博物馆藏)

平遥清虚观

刘晋清

平遥清虚观是平遥古城内最大的道观，原名太平观，始建于唐高宗年间，几经易名，至清代复称此名至今。2006年，国务院批准其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虚观建筑构思奇特，布局严谨，中轴线左右分布对称，外观壮丽，内涵丰富。观内现存元代以来的彩绘泥塑8尊，宋、元、明、清各代碑碣30通。



清虚观内纯阳宫

清虚观共有10座建筑，前后三进院落，在中轴线上有牌楼、山门、龙虎殿、三清殿、纯阳宫、玉皇阁等。观院门牌楼竖于两柱，由八字形立柱稳固，上有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题“清虚仙迹”匾额。龙虎殿、三清殿均为元代修建、明代重修。

龙虎殿面宽五间，进深六椽，采用“悬梁吊柱”的特殊结构，殿下面东西廊分塑明代青龙、白虎二神像，高达5米，骨骼雄健，怒目而视，手持利剑，神态勇猛。

三清殿于明万历年间重建于中院北面，结构奇特，殿宇高大壮观。在三清殿内竖立有一透灵神碑，原名蒙汉碑，通高205厘米、宽90厘米、厚23厘米，为元代作品，距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碑正背两面都刻有铭文，记录着成吉思汗的丰功伟绩。

纯阳宫重建于清光绪年间，面宽三间，六椽卷棚式，悬山顶，前有抱厦，斗拱五踩，双昂，补间一攒，屋面装饰繁复，色彩华丽，整体风格趋于小巧轻盈，而又有几分柔性之美。整座官殿，成为清虚观的主体建筑之一，是研究道教文化的实例。

清虚观的建筑选址和建筑构思，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人恪守“礼制”的建造思路，以及在布局上追求“人、天地、建筑”之间的和谐理念。

小娘子身世不详 墓志盒实属罕见

彭娟英

太原晋祠村有座晋代“王氏小娘子墓”，保存完整，时代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是迄今为止太原发现的唯一一座后晋墓葬，其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墓中出土的五孔青石墓志盒，特色鲜明，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2005年9月，为配合基本建设，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一座后晋墓——王氏小娘子墓。墓葬位于太原市晋源区晋祠村，西依悬瓮山，南毗晋祠，北三公里处是晋阳古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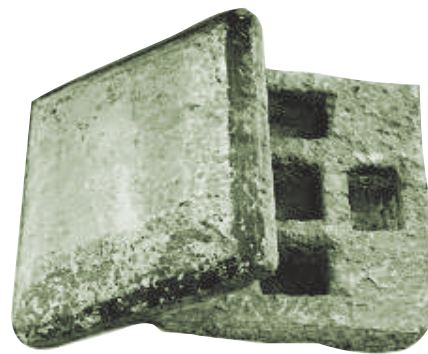
墓葬形制为单砖室墓，坐北朝南，墓室为仿木结构砖雕彩绘。此墓葬内除出土有陶、瓷、银、漆器等随葬器物外，在墓主人木棺下面，还有一块正方形腰坑，坑内埋着一块方形的青石。腰坑墓葬葬俗最早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和西周在北方地区非常盛行，是在墓底中央墓主人腰部下方的位置专门挖一个小坑，坑内可以殉牲或者殉葬一些物件。五孔青石墓志盒较为少见，太原地区仅有两例，另一例出土于晋阳北汉太惠妃墓。

一般认为，这种石盒既作为墓志志石，又起镇墓避邪的作用。五孔青石墓志盒正面中心和四边挖五个方格，分别放置无色水晶、紫水晶、雌黄矿石、雄黄矿石、朱砂。墓志盖上四角饰缠枝牡丹，盘绕四周饰缠枝菊花。志文为楷体，共128字，写明墓主为郡望琅琊(出身于琅琊的名门大族)王氏，未提及死因，只称其为“小娘子”，可知其年轻轻轻就死于晋阳。“小娘子”在后晋时代指的就是少女，可以用来称呼他人之女或称自己的女儿，也可以称年轻妇人为小娘子等，这种称谓在明清小说里也多有沿用。葬者为郭知密，在河东节度使手下任要职，掌管盐运业和酿酒业，又任级别颇高的文散官和勋官。墓主与郭氏关系，墓志未提及。

随葬器物中的陶塔式罐、铁犁，在太原地区唐墓中频繁出现，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瓷碗和白瓷碗，胎釉结合紧密，器表规整，底足已经摆脱唐器玉璧底的形状，被圈足取代，器底挖足工艺已近成熟，表现出宋代瓷器特征。铜镜材质薄，镜背纹饰大量使用连珠纹、乳钉纹，在主要区域饰钱纹，在唐镜中少见，而多见于宋镜中。

墓主葬于后晋天福二年(937)，即后晋代后唐的第二年，正值王朝更替的剧变期，埋葬规格较高。而此墓葬形制表现了朝代更迭的时代特征，墓室底面近圆形，介于唐代盛行的方形墓和宋代多边形墓葬之间。北朝、隋唐时期惯用的床脚壶门装饰，此墓仍在沿用。

该墓兼具佛、道教风格，陶塔式罐和棺床脚的壶门装饰为佛教惯用，而棺床腰坑及墓志铭文，则具有道教文化色彩。王氏小娘子墓的发掘为研究唐五代时期腰坑墓及佛教和道教文化发展提供了实物资料。



太原“王氏小娘子墓”出土的后晋五孔青石墓志盒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供图